

权力与偏见： 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

温 尧

内容提要：崛起国的治理知识是其发展经验和治理成果所凝聚的观念性物品，“讲好本国故事”、传播治理知识能否帮助崛起国解决“挨骂”问题？当前的国际结构倾向于给出悲观答案。一方面，当代崛起国成长于附着意识形态偏见的国际秩序中，有强烈动机展现自身治理知识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随着权力结构压力的增大，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增强。这两种动态相互强化，形成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这一机理可以延伸为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治理知识差异与权力结构压力互相调节对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正向影响，权力结构压力跨过“阈值”则可能激活模式竞争威胁。因此，治理知识传播的时机影响其是否触发高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尽管中国在传播治理知识时回避意识形态对立，但意识形态二分和大国权力接近的结构性背景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居高不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80年代的日本和冷战后的新加坡各自不同的“挨骂”经历，进一步印证了意识形态责难的生成机制，并凸显当代中国所处时空背景的特殊性。“挨骂”难题是崛起过程的独特副产品，当代崛起国须对治理知识传播的效用有合理预期。

关键词：权力结构 意识形态 治理知识 崛起国 “挨骂”问题

作者简介：温尧，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在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挨骂”问题仍未解决，其中，来自西方的

^{*} 本文受2021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编号：2021PJC012）的资助，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意识形态责难是最核心的挑战。^① 有观点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② 而“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③ 与此同时，中国在讲述故事和传播经验时有意识地避免激化大国意识形态对立。中国明确宣示，“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④ 可是，近年来，中国仍然显著受到“挨西方骂”的困扰。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能否帮助中国解决“挨骂”问题？崛起国为何容易陷于意识形态责难之中？

本文聚焦大国关系，试图从结构层次提出论点。从崛起国的视角来看，努力改善外界看法、避免意识形态之争都是积极、平和的姿态，理想情况下应当缓和“挨骂”问题。但是，崛起国的意图或许难以回避结构性的困境。在意识形态二元区隔和大国权力接近的背景下，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不断增强，崛起国积极传播治理知识反而可能强化守成国的防范意识，从而形成“挨骂”的恶性循环。考察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将进一步凸显当代崛起国一守成国互动进程的特殊性，崛起国在权力结构压力高企时传播治理知识，相比其他阶段更有可能触发高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

第二部分将梳理既有文献，引出本文的理论进路。第三部分将在理论层面探讨当代崛起国治理知识传播难题的生成机制——来自守成国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并将之拓展为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意识形态责难程度可被视为与权力结构压力有关的分段函数，治理知识差异感知和权力结构压力可以共同解释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防范的烈度变化。第四部分将基于本文的理论视角，呈现当代中美所处的

①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载《求是》2016年第9期，第6~10页。

② 乐玉成：《讲好中国故事，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载《联合时报》2020年12月22日，第6版；王翠梅：《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1期，第145~148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329~330页。

④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2019年9月），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9日，第11版。

□ 当代亚太

结构性背景及其引致的“挨骂”难题，并讨论其他三个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80年代的日本，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新加坡）。这四个案例的对比既可印证本文描述的一般性机理，也凸显出当代中国面临的独特处境。最后是结语。本文的发现有助于说明崛起国“挨骂”问题的特殊性质，如何应对这一难题更加考验崛起国的定力和智慧。

二、大国政治与治理知识

本文将一国的治理知识定义为从该国治国理政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观念性物品，其中不仅包括根本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好，也包括具体的制度、政策和实践等。^① 治理知识这一概念可以较好地覆盖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以利于理论构建和经验分析。一是这个概念具备“意识形态中性”，即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都可能从事传播上述观念性物品的活动，而不需要有特殊的“输出一整套模式”的冲动作为基底。虽然一国的治理知识可能包含意识形态因素，但治理知识传播的内容未必包含意识形态。二是这个概念有助于涵盖更丰富而微妙的差异性，即使被普遍认为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也可能产出并传播不同的治理知识。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从事的（西式）民主推广活动并不涵盖完全相同的“民主”知识，^② 其路径和内容的区别反映出各国具体的政治实践差异。^③ 三是这个概念又与一国的核心意识形态紧密联系。治理知识是对本国治理体系成功经验的总结，外部对于本国治理知识

^① David Dolowitz, “Policy Transfer: A New Framework of Policy Analysis”, in David Dolowitz et al., *Policy Transfer and British Social Policy: Learning from the USA?*,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 Ting-Yan Wang and Hong Liu, “An Emerging Asian Model of Governance and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Vol. 11, No. 2, 2018, p. 126.

^② 值得说明的是，不同国家的治理知识包含对于“民主”定义及多样性的不同认识。比如，中国提出，“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民主本义被少数国家异化歪曲……西方选举制度被包装成民主的唯一标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2021年12月），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第5版。

^③ Henry Nau, “America’s Identity,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Beyond Realism, beyond Idealism”, in Michael Cox, G. John Ikenberry and Takashi Inoguchi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7-148; Jeffrey Kopstein,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over Democracy Promo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2, 2006, pp. 85-98.

的正面评价又有助于增强本国价值观的合法性。这一联系也符合中国官方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主题的认知。

既有研究围绕大国政治与治理知识的互动展开了多方面探索，本文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并试图进一步廓清这些因素间的微观互动机理。本文之所以聚焦于崛起国一守成国这一对关系，主要源于在大国权力结构紧张背景下，大国关系极大地塑造（或限制）了崛起国在治理知识传播层面的处境及潜在的能动性空间。

第一，既有研究指出，大国兴衰对于国际体系中的政体分布有着重大影响。谢瓦·古尼茨基（Seva Gunitsky）发现，历史上的政体变迁浪潮通常发生在大国权力结构突变之后。大国的物质能力使其得以使用“大棒”和“胡萝卜”促动其治理知识被他国接受，大国也更能决定国际体系中怎样的治理知识是正当、恰当的。^①凯文·纳瑞兹尼（Kevin Narizny）认为，历史上（西式）民主大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接连胜利造就了当今国际体系中（西式）民主政体占优的局面。^②加莱斯·波许（Carles Boix）指出，大国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分布决定大国是否以及如何推动政体变迁。^③这些研究为政体变迁提供了基于长时段历史演变的体系性解释，它们的关注点在于大国权势起伏的宏观图景如何决定国际体系中政体的最终分布情况，而这通常是重大国际事件“冲击”（如大战、经济危机等）的结果。

第二，有学者关注大国竞争中的理念维度，指出权力结构对理念变化的塑造作用。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蒲晓宇主张，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国发起权力挑战之前，必须先用自身的独特理念消解霸权国既有理念的合法性。^④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认为，伴随着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商业理念总是会相应得到重塑，以适

① Seva Gunitsky, *Aftershocks: Great Powers and Domestic Refor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8.

② Kevin Narizny, “Anglo-American Primacy and the Global Spread of Democracy: An International Genealogy”, *World Politics*, Vol. 64, No. 2, 2012, pp. 341-373.

③ Carles Boix,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No. 4, 2011, pp. 809-828.

④ Randal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 41-72.

□ 当代亚太

应崛起大国的固有理念。^①徐进提出,理念竞争以权力竞争为基础,大国间物质实力的接近才会揭开理念竞争的序幕。^②据中国学者观察,中美两国正围绕国际秩序构想和国内发展价值观展开理念层次的博弈,特别是美国主动在国家治理、国际交流等维度推动意识形态分野、建构“中国威胁”。^③

第三,既有研究也重视意识形态对大国政治发挥的作用。马克·哈斯(Mark Haas)认为,意识形态差距和大国意识形态的分布情况决定了大国的威胁认知和安全政策取向。^④约翰·欧文(John Owen)认为,意识形态极化容易导致大国选择武力改变他国政体。^⑤杨光斌和宋伟提出,政治思潮的变迁是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治理知识的扩散往往伴随着国际格局的重组和国际权势的再分配。^⑥权力转移范式下的实证研究经常将崛起国和守成国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视为崛起国不满情绪的来源。^⑦节大磊则认为,当今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进入了类似安全困境的状态。^⑧

建立在既有文献之上,本文试图探索治理知识差异与权力结构压力之间的双向互动。本文虽然紧密关注大国所处的结构性背景,但聚焦于大国互动中微观的“日常政治”。大国治理知识的日常流动和意识形态摩擦并不意味

① Charles A. Kupchan,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and the Coming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Security Studies*, Vol. 23, No. 2, 2014, pp. 219-257.

②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第9页。

③ 孙茹:《理念分歧与中美国际秩序博弈》,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9~18页;赵可金:《“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载《美国研究》2020年第3期,第28~33页;信强、陈宸:《“中国威胁新叙事”及其对中美人文交流的影响:以特朗普时期为例》,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29~33页。

④ Mark Haa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1789-198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Mark Haas, “Ideological Polarity and Balancing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23, No. 4, 2014, pp. 715-753.

⑤ John Owen,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tates,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

⑥ 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24~40页;宋伟:《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与作用机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0~20页。

⑦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4, 2003, p. 320;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49-50.

⑧ 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84~108页。

着政体的骤然变化，但其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责难却对大国竞争的形式和走向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权力结构压力与意识形态偏见的叠加给崛起国造成了自我强化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进而影响了治理知识传播在大国政治中的潜在作用。

三、当代崛起国治理知识传播难题的生成机制

本部分提出本文的核心分析框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动力与守成国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同时达到高位，二者的相互强化形成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这一特殊情况可以延伸为意识形态责难的一般化公式——治理知识差异凸显程度与权力结构压力互相调节对方的正向作用，而在权力结构压力的变化区间中存在激活模式竞争威胁感知的“门槛值”，从而影响了治理知识传播的可能效用。

（一）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动力

治理知识是一种独特的观念性物品，它包含一个国家发展历程的自我总结，是对本国治理成果的肯定。当自身治理知识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劣势时，崛起国有动力且有能力积极地进行对外传播。

第一，传播治理知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本质需求。从自身崛起经历中提炼出来的治理知识与一国的自我认知和自尊高度关联，随着权势的增长，该国获得正向认知和承认的需求也在增加。心理学研究指出，个体不仅与社会中的其他个体相比，还会将自己的进展与过往相对比。个体跨时间维度的成长将提升自我评价。^① 自我评价的提升需要得到他者的认同，因此，崛起国有动机对外传播自身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当崛起国认为他者对其治理知识的评价不符合其自我认知时，由此带来的不满将促使其传播“正确的信息”，以塑造符合自我认知的国际评价。

因为知识的流动性，本国治理知识在国际上受到认可也可以反过来向国内民众提供证据，彰显其治理知识的声誉和影响力。从崛起国的国内动员和

^① Ethan Zell and Mark D. Alicke, “Self-Evaluative Effects of Temporal and Soci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5, No. 1, 2009, p. 226; Joshua Freedman, “Status Insecurity and Temporality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 2016, pp. 803-805.

□ 当代亚太

团结的角度而言，对一国治理知识的正面国际评价有助于稳固其在国内的正正当性，回击质疑声音。^①

第二，主动向他国分享治理知识是崛起国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方式。崛起国之所以能崛起，概因其摸索出了独特的、成功的成长路径，有充足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为他国供给治理知识因此成为崛起国展现自身优势、凸显能力的信号释放载体，进而提升崛起国的地位和影响力。^②

第三，一些治理知识的传播是通过政治精英间面对面交流实现的。长期而言，治理知识的传播增加了政治精英间的互动频率，也促进了理念和认知的趋近，由此可能推动崛起国培育与他国政治精英正面的情感 and 关系，促进政策协调和国际合作，乃至发展出更加密切、稳固的伙伴关系。^③

第四，值得强调的是当代崛起国所处的独特时代背景。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单极体系的到来，国际主导话语将美国的治理知识描述为“更好的知识”，西式民主政体在国际体系中占据巨大优势。在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中，（西式）民主政体附带了“正面价值和道德含义”，被视为“最好的政府形式”，^④成为判定国家性质优劣的主要标准之一。在这一道德视角下，主权国家间是不平等的。被判定为“非民主”的国家没有资格成为（西式）

① John Owen,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tates,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 pp. 4-7; Heike Holbi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Legitimacy: Reflections on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2, 2011, p. 178.

② Lilach Gilady, *The Price of Prestig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p. 100-109; Xiaoyu Pu, *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74-75.

③ J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5; Lina Benabdallah, *Shaping the Future of Power: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Network-Building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④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2, 1999, p. 193;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1, 2009, p. 74.

自由秩序的成员，在道德上处于劣势。^① 因此，“非民主”国家一直处于较为强烈的民主化压力之下，民主推广——西方民主国家一整套治理知识的传播——被视为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行为。

在这种国际意识形态结构背景下，被视为“非民主”的崛起国早在崛起之前就已经处于有系统性偏见的体系之中，因而有着独特的焦虑和不满。为了提升国际形象、稳固政局，很多中小“非民主”国家往往选择模仿“民主”国家的制度和政策，用趋同的方式获得体系主导国的认可。^② 但是崛起国本就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自信的独特治理知识，出于维护地位和政体合法性的考虑，崛起国拒绝随波逐流，而是主动展现自身治理知识的独特性和价值。为了配合国家利益需求，崛起国也倾向于更多地对外传播治理知识以建立基本的理解和认同，扭转外界的负面认知。因此，当代崛起国在国家实力快速增长时，尤其具备强烈的动机和能力对外传播治理知识，以应对“挨骂”局面。

（二）守成国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

面对存在治理知识差异的崛起国，守成国容易产生意识形态防范倾向，进而对崛起国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打压和责难。从守成国的角度而言，崛起国带来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感主要来自两条路径——“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尤其是当崛起国与守成国权力日益接近时，这两条路径更易被激活。

第一，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意识形态责难是身份对比的反映。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个体能够通过比较自身与他者在重要品质上的优势而获得自尊和积极自我认同的建构，^③ “分类需要比较，而比较引致

^① Yongjin Zhang, “China and Liberal Hierarchies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wer and Negotiation for Normative Cha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4, 2016, pp. 803-806; Bentley Allan, Srdjan Vucetic and Ted Hopf, “The Distribu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Hegemonic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4, 2018, p. 841.

^②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906; Susan D. Hyde, “Catch Us If You Can: Election Monitoring and International Norm Diffu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 2, 2011, p. 367.

^③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1995, pp. 241-243; Henri Tajfel and John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Key Reading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p. 281-284.

□ 当代亚太

竞争”。^① 但无论是出于心理需要本能还是政治目的，比较对象和比较标准都是有选择性的。一方面，崛起国较容易成为守成国的比较对象。实证研究表明，一国通过横向比较来突出自身正面价值时所选取的对象并不是任意的他者，而是一些在重要方面与自身接近、但又能凸显自身优势的同侪。^② 在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守成国的视角看来，崛起国实力强大却在治理知识方面有重大缺陷，是比较适用于突出自身治理知识优势的“稻草人”。

另一方面，对待同一个国家，守成国会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改变评价标准。在心理机制和政治动机的作用下，一国的政策制定者通常不会自愿自发地承认他国的高地位，而是倾向于“顾左右而言他”，避免给予高评价。^③ 特别是当崛起国在诸多领域即将追上甚至赶超守成国时，因为忌惮自身地位不保，或担心崛起国的高地位带来其他不利影响，守成国倾向于拒绝给予足够的地位承认，而是转而用更加于己有利的标准评价崛起国。^④

因此，凭借自我认为的意识形态优势打压崛起国的治理知识既有利于守成国巩固自我认同，又是守成国开展大国竞争的有力手段。正如关于地位问题的研究所揭示的，内在心理需求和工具性目的紧密结合、难以割裂。^⑤ 特别是当崛起国积极传播治理知识时，其治理知识在国际上的高曝光度凸显区分和比较的需要，从而促使守成国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层面的身份对比。

第二，守成国还可能担心崛起国对国际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分布造成全局性影响，从而触发模式竞争。守成国倾向于将自身的属性和偏好等同于现状，

①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p. 243.

② Robert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4.

③ Jonathan Mercer, “The Illusion of International Presti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4, 2017, pp. 133-168.

④ Lilach Gilady, *The Price of Prestig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51; Steven Ward, “Status, Stratified Rights, and Accommod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20, pp. 160-178.

⑤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2-84; Ori Heffetz and Robert Frank, “Preferences for Status: Evidence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in Jess Benhabib, Alberto Bisin and Matthew Jack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1A,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11, pp. 73-74.

而与之相左的行为则被视为谋求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表现，修正主义国家常常被其先验地假定为有意颠覆既有秩序。^① 特别是在单极体系中，改变国家间不平等现状的行为被守成国天然地视为修正主义行为。^② 当崛起国对外传播与守成国不同的治理知识时，即使崛起国无意通过这种行为输出意识形态，守成国仍然倾向于将其视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威胁。崛起国的强大能力意味着治理知识传播的范围和规模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构成体系性的挑战。

同时，即使崛起国不主动大规模传播治理知识，其治理知识通常有较大潜力造成“示范效应”而被他国主动了解和吸收，由此加深了守成国的危机感。根据历史经验，一国国内治理程度的高低和治理结果的好坏，对于他国是否信服并学习该国的治理知识有重要影响。^③ 当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治理知识有较大差别时，前者吸引力的提升意味着一些国家在治理知识方面将偏离守成国的预期，对守成国形成直接的意识形态威胁。特别是在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守成国的相对衰落和崛起国的相对崛起造成最直观的治理绩效对比，其示范效应更加瞩目，从而增加了模式竞争的可能。

（三）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及其一般化延伸

在意识形态二元区隔、大国权力结构压力增大的特殊国际结构下，崛起国具有强烈动机积极传播治理知识，而守成国则显著地强化意识形态防范倾向。如图 1 所示，这两种动态的同时运行形成了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或曰“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系统中，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虽然是对意识形态责难的反应，却可能反而刺激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进而激化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意识形态责难。因此，尽管崛起国有意回避意识形态对立，但在意识形态偏见和权力结构压力叠加的结构背景下，仍然面临“挨骂”可能升高的挑战。

① 温尧：《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5期，第35~37页；Kai He, Huiyun Feng, Steve Chan and Weixing Hu, “Rethinking Revisionism in World Politic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2, 2021, p. 163.

② Randal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p. 46.

③ Thomas Ambrosio,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Concepts, Dynamics,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1, No. 4, 2010, pp. 382-384; Benjamin Fordham and Victor Asal, “Billiard Balls or Snowflakes? Major Power Presti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07, p. 49.

□ 当代亚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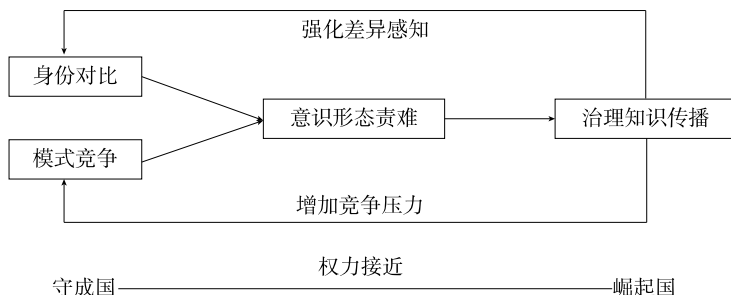


图 1 当代守成国对崛起国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1 所描绘的“正反馈循环”是基于当前时空背景下守成国—崛起国互动而构建的分析框架。尽管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也是围绕这一特殊条件下的大国关系展开，但其机理可以延伸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了将本文的主要理论主张一般化和抽象化，以下提出一个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简约公式，以呈现相关因素的动态作用：

$$\text{意识形态责难程度} = \begin{cases} \beta_1 \text{ 身份对比} & (\text{权力结构压力} < \alpha) \\ \beta_2 \text{ 身份对比} + \beta_3 \text{ 模式竞争} & (\text{权力结构压力} \geq \alpha) \end{cases}$$

关于这一简约公式的内涵和局限性有以下说明。第一，基于意识形态防范倾向的机制分析，该公式将意识形态责难程度转化为更易操作化的两个维度——身份对比引发的责难程度以及模式竞争引发的责难程度。意识形态责难程度与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一个分段函数，当权力结构压力不足时，意识形态责难基本上是基于身份对比形成的，系数 β_1 为正数；当权力结构压力超过一定的威胁门槛 α 时，意识形态责难不仅包括身份对比产生的偏见，还包括模式竞争引发的忧虑，系数 β_2 和 β_3 为正数。

其中，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均与国家间的治理知识差异及权力结构压力存在正向关系。给定权力结构压力，守成国认知中的治理知识差异越大，两个维度的责难越强烈；给定治理知识差异，守成国感受到的权力结构压力越大，两个维度的责难也会越强烈。总之，治理知识差异和权力结构压力彼此调节对方对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作用，而权力结构压力决定意识形态责难是否上升到模式竞争层面。

第二，该公式仅是一种抽象模型，其主要作用在于直观呈现意识形态责难程度随相关因素变化的方向，而非提供严格的、跨越时空的定量取值标

权力与偏见：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 □

准。根据这一公式，在当前国际体系内，当权力结构压力接近峰值，而守成国对崛起国怀有较大意识形态偏见时，崛起国面对的意识形态责难的两个维度都会接近这个体系内可能的峰值。而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会进一步凸显守成国感知到的治理知识差异及大国竞争压力，从而正向影响意识形态责难程度。这一推论彰显了当代崛起国所遇治理知识传播难题的特殊之处。

相比之下，当治理知识差异的凸显程度和权力结构压力都未达到较高值时，一国遭遇的意识形态责难程度将显著低于上文中崛起国的处境。尤其是当权力结构压力不够大时，模式竞争忧虑不会被触发，一国或许只会遭遇较低烈度的、基于身份对比差异的批评。在这种背景下，崛起国积极传播治理知识也不会显著强化意识形态责难。因此，治理知识传播发生的时机影响其潜在效用。总体上，该公式可以转化为表 1 的理想型分类，除去两个因素取极值的情况，大部分真实世界案例多处于不同理想型之间的状态。

表 1 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理想型分类

	权力结构压力小	权力结构压力大
治理知识差异凸显	中等烈度身份对比	高烈度 身份对比叠加模式竞争
治理知识差异不彰	低烈度身份对比	低烈度 身份对比叠加模式竞争

资料来源：同图 1

第三，该公式中的系数和变量的取值都随时空背景变化。也就是说，即使对该公式进行定量赋值，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也无法直接通过数值大小的比较来确定程度差异。这是因为，类似的社会现象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存在异质性，变量和机制的含义及其具体呈现形式也与时空背景相关。^① 比如，当代大国的治理知识传播手段比过去受到更多限制。历史上的大国经常为了推广自身的政治制度和理念而侵略他国，或在战争胜利后将自身治理知识移植给败方。^② 但是，随着国际体系的演进，侵略和占领作为大国工具不仅代

① 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第147~149页。

② John Owen,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tates,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 p. 2.

□ 当代亚太

价高昂，而且在规范层面也逐渐变得不道德和不可接受。^① 强制移植的治理知识经常难以在被动接受国生根发芽，甚至可能反噬大国利益。^② 又如，传媒手段的发展塑造了不同时代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规律。根据实证研究，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助长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并且可能加剧政治极化。^③ 将崛起国刻画为既有秩序挑战者的网络模因（meme）参与建构了大国敌对的叙事，并且消解了其他更加平和的叙事的生存空间。^④ 总之，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置于各自背景中考察，确定其在表 1 所框定的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而非将不同案例进行绝对化的、同质化的比较。

四、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比较

为了呈现本文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通过比较映衬当代崛起国的独特处境，本部分不仅讨论当代中国遭遇的意识形态责难，还将考察三个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80 年代的日本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新加坡。虽然无法进行绝对意义上的量化比较，但这四个案例在其各自时空背景下的取值各具特色，其面临的意识形态责难的程度可用于透视本文提出的机理。当代中国的治理知识被美国视为存在高度差异甚至对立，且美国日益受到权力转移进程带来的结构压力；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在治理知识差异和权力结构压力两个方面的取值虽然较高，但均显著小于其所处国际体系内的可能上限；80 年代的日本与美国之间治理知识差异较小，权力结构压力高企；冷战后的新加坡与美国在治理知识层面差异较大，权力结构压力则保

① Tanisha Fazal, *State Death: The Politics and Geography of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Annex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1, 2010, pp. 31-55.

② Alexander Downes and Lindsey O' Rourke,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Why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Seldom Improves Interstat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2, 2016, pp. 43-89; 赵明昊:《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3 期, 第 102~133 页。

③ Ekaterina Zhuravskaya, Maria Petrova and Ruben Enikolopov,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12, 2020, pp. 415-438.

④ Adam Breuer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Memes, Narratives and the Emergent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4, 2019, pp. 429-455.

持低位。这四个案例所呈现的意识形态责难程度将展示治理知识差异与权力结构压力的叠加作用，并显露时机对治理知识传播效用的重要意义。

（一）当代中国

冷战结束后，早在成为国际体系中最瞩目的崛起国之前，中国就已经面临着带有系统性意识形态偏见的国际秩序。实证研究发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强硬派的论据是中国的“非民主”制度，接触派的论据则是中国将会“民主化”——无论主张对华强硬或接触，其论点往往都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身份对比密切相关。^① 国际体系中意识形态的二元区隔既是中国作为崛起国传播治理知识的动力来源，也是美国加强意识形态防范的基础。这两个动态恰好同步于权力转移进程。在这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中国虽然避免造成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却仍陷入高烈度的、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责难之中。

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发展，中国逐渐着手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将治理知识与世界分享，特别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参考。在诸如《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等重要的国际合作文件中，常常可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表述。^② “分享我国在扶贫、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经验做法”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人文公共产品的重要内容。^③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席重要国际会议时也常公开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精英提供访问中国并接受能力建设培训的大量机会。^④ 与此同时，中国清楚地认识到，治理知识传播可能与意识形态议题发生关联。中国在分享自身治理知识时常强调，中国的发

① Jarrod Hay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Security: U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58; Chi-hung Wei, “Engaging a State that Resists Sanctions Pressur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1992-1994”,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2, 2015, pp.429-449.

②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载《人民日报》2018年9月5日，第3版；《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3日，第2版。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7年12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1/content_5249241.htm。

④ 在201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习近平谈到中国已经“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 当代亚太

展道路是立足于本国实际探索出来的，各国不能机械地照搬某一种模式。^①

尽管如此，在西方主流讨论中，中国的治理知识被视为相对于西方治理知识的“他者”，其对外传播则被视为需要应对的“问题”。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外政界和学界人士开始讨论“中国模式”（China model）、“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以及中国的“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②这类讨论的关注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可能产生并输出“另类”的治理知识，挑战、削弱甚至取代西方治理知识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发展经验或许证明，一个国家不需要经过“（西式）民主化”，也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③

随着权力的接近，美国在考量中美战略竞争时，日益关注中国治理知识的体系性意涵。美国政策界对华强硬的呼声日渐高涨，且成为两党共识，其背后一大原因即是对中国政府性质和治理模式的消极判断。^④崛起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也给了美国工具性地利用这一因素的空间。许多政策分析从实用角度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对于美国而言有战略裨益，可以有效地动员美国国内民众和盟友。^⑤

在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首次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且被指“扩散包括腐败和监视手段在内的威权体制特征”。^⑥拜登政府于2021年年初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①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2019年9月）。

②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2015, p. 158; Suisheng Zhao, "Whither the China Model: Revisiting the Deb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3, 2017, p. 10.

④ Aaron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Vol. 60, No. 3, 2018, pp. 7-8; Joshua Shifrins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1, No. 4, 2018, pp. 68-69.

⑤ Aaron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p. 10; Hal Brands and Zack Cooper, "U. S. - Chinese Rivalry is a Battle over Values: Great-Power Competition Can't Be Won on Interests Alone", *Foreign Affairs*, March 16,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16/us-china-rivalry-battle-over-values>.

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p. 25.

提到，“反民主力量……推行另类的威权政府模式”。^① 相比之下，在中美竞争尚不剧烈的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未将中国与威权治理知识的扩散明确联系起来，“威权”一词也甚少出现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高烈度意识形态责难已经建立在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叠加之上。

“民主”与“威权”间的力量对比日益出现在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议程中。2021年3月31日，在关于“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的国内讲话中，拜登用大国意识形态对立论证其计划的紧迫性。他提到：“我真心认为，日后历史会将此时此刻视为根本抉择之时——我们必须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做出选择……这是美国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间竞争的实质。”^② 2021年12月，美国政府举办首次“民主峰会”。拜登将捍卫（西式）民主称为“当代的根本挑战”（defining challenge of our time），并指出，威权国家“试图增进其权力，在全世界输出、扩张其影响力，并将其压迫性的政策实践美化为更有效应对当今挑战的方式”。^③ 可见，拜登政府正用统一的话语框定其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不同治理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对立被用于包装其根本关切，而中国则被视为威胁美国和西方治理知识的最大因素。

在众多拜登团队人员近年的政策分析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其严防中美模式竞争的心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则常成为此类讨论引用的论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在2019年撰文指出，尽管中国不寻求输出政治制度，但其最终对美国造成的意识形态挑战甚至可能大于苏联。他们认为，中国将“威权资本主义和数字监控”结合起来的治理经验或产生比具体的意识形态还大的吸引力。^④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安全高级主任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也表达过关于

①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p. 7.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American Jobs Plan”, The White House, March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31/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american-jobs-plan/>.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Opening Session”,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opening-session/>.

④ Kurt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n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2019, p. 107.

□ 当代亚太

“中国挑战”的类似观点。^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利安·格维茨 (Julian Gewirtz) 强调, 中国疫情防控技术的吸引力及其对 (西式) 民主的挑战不可小觑。^② 同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 (Rush Doshi) 推断, 中国所主导的地区和全球秩序将遍布威权规范, 重挫自由主义价值观。^③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劳拉·罗森博格 (Laura Rosenberger) 则主张, 美国应在政治、经济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充分发掘 (西式) 民主价值观相对于威权制度的优势, 针对性地应对威权大国的挑战。^④

可以看到, 在各个领域为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官员几乎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 不但聚焦于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 而且高度防范中国治理知识潜在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对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造成的“威胁”。中美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均存在高度的结构性压力, 两国关系的这一特殊阶段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烈度居高不下。

(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

希特勒德国如今被视为试图颠覆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的典型案例,^⑤ 纳粹主义指导下的德国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手段亦为世人所不齿。但是,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德国的治理知识并没有被美国明确地拒绝和唾弃。在当时的美国政坛和社会, 对德国治理知识的公开正面评价并不鲜见。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大国用于传播治理知识的手段受到的限制显著少于当代。德国利用各种外交政策工具和跨国联系传播治理经验, 特别是宣扬及移植自身在维护国内稳定、发展经济、设计社会政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① Tarun Chhabra, “The China Challenge, Democracy, and U. S. Grand Strategy”, Brookings, February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china-challenge-democracy-and-u-s-grand-strategy/>.

^②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and Julian Gewirtz, “China’s Troubling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 Why Beijing’s Model Must Not Become the World’s”, *Foreign Affairs*, June 10,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7-10/chinas-troubling-vision-future-public-health>.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302.

^④ Zack Cooper and Laura Rosenberger, “Democratic Values are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2,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2-22/democratic-values-are-competitive-advantage>.

^⑤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Ltd., 1983, p. 176.

德国既为欧洲、中东、拉美等地的法西斯社会运动提供经济资助和技术支持，也利用跨国社会经济联系与亲法西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勾结。德国甚至联手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通过强制方式移植了自身的治理知识。^①

尽管如此，德国此时受到的意识形态责难烈度较低，与其所处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结构有关。在权力结构方面，二战前的德国与美国处在催生了典型的大国制衡缺位现象的多极体系内，^② 彼时美国并不是体系的单一霸权国，也不与德国构成针锋相对的权力竞争关系。相反，大萧条的打击加深了美国本就存在的孤立主义倾向，导致其迟迟不愿介入欧洲的冲突。^③ 直到1940年年初，美国仍研判德国并不构成对美国本土和西半球的重大威胁，尽管美国已开始做军事准备，但其军方、国会和民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安全忧虑。^④ 在意识形态层面，受到大萧条重创的美国和西欧国家遭遇国家治理困顿，促使其政治和社会精英尝试借鉴新的治理知识，以恢复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彼时兴起的两种思潮分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所蕴含的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终极目标是西方资产阶级最为惧怕的；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虽然有违自由民主原则，但看似以更不激进的方式弥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⑤ 总体而言，当时的德国无论在治理知识差异还是权力压力方面都不是体系内最大的挑战者，使其受到较低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

在孤立主义、反共和反犹等思想的作用下，彼时美国国会、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商界和高校之中充斥着大量同情纳粹、反对美国介入欧洲事务

① Kurt Weyland, "Fascism's Missionary Ideology and the Autocratic Wave of the Interwar Years", *Democratization*, Vol. 24, No. 7, 2017, pp. 1258-1259; John Owen,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tates,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 pp. 178-180; Seva Gunitsky, *Aftershocks: Great Powers and Domestic Refor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42-149.

②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1990, pp. 137-168.

③ 布鲁斯·拉塞特 (Bruce Russett) 在1972年出版的专著中认为，即使是事后而言，美国仍然不应该介入欧洲的大战，因为美国当时并不面临结构性的威胁。Bruce Russett, *No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 Skeptic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④ Stetson Conn and Byron Fairchild,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 Framework of Hemisphere Defense*, Washington, D. 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89, pp. 25-29.

⑤ Kurt Weyland, "Fascism's Missionary Ideology and the Autocratic Wave of the Interwar Years", p. 1254; Seva Gunitsky, *Aftershocks: Great Powers and Domestic Refor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11-116.

□ 当代亚太

的力量。比如，美国神父查尔斯·柯格林（Charles Coughlin）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通过广播电台宣扬反犹主义思想，表达对德国政策的同情和理解。据统计，到 1938 年时，美国有 1500 万人一周至少收听两次柯格林的广播，有 2900 万人每月至少收听一次。^① 由于这股力量的存在，在美国控诉德国恶行的声音被稀释——有人认为，德国只是惩罚一小批“罪有应得”的犹太人；有人推断，反犹只是希特勒暂时的国内斗争策略；有人指责美国犹太人试图找借口将美国拖入战争。^②

彼时，在许多美国精英的眼中，德国靠高效的组织运转和成功的社会政策规划解决了大萧条带来的社会问题，美国对德国治理知识的兴趣也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政策上。^③ 奥伦（Ido Oren）指出，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学界，学者长期认为公共管理是一门“非政治”的学问，管理技艺可以与政治或意识形态无涉，而且可以移植到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中。加之普鲁士王国的公共管理和市政能力在美国扬名已久，不少美国学者乐见希特勒带领的德国在这一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拓展出新的公共管理知识。^④ 1934 年，美国政治学协会（APSA）主席沃尔特·谢泼德（Walter Shepard）甚至在协会年会上直言美国的民主体系需要改变，平等的普选权存在缺陷，“我们已经认识到法西斯原则和实践中的很大一块是我们必须移植过来的”。^⑤

在实际决策层面，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试图在保持基本民主价值的同时学习德国的政策设计，特别是社会福利体系。帕特尔（Kiran Klaus Patel）指出，罗斯福新政之初就操办的“平民保育团”（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深受德国的“国家劳役团”（RAD）的影响，

① Bradley Hart, *Hitler's American Friends: The Third Reich's Suppor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8, Appendix.

② Brian Scott Johnson, “‘Just Like Hitler’: Comparisons to Nazism in American Cultur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y 2010, pp. 83-89; Susan Welch, “American Opinion toward Jews during the Nazi Era: Results from Quota Sample Polling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5, No. 3, 2014, pp. 617-619.

③ Sandrine Kott and Kiran Klaus Patel, “Fascist Internationalism: Nazi Social Policy as an Imperial Project—An Introduction”, in Sandrine Kott and Kiran Klaus Patel eds., *The Social Policies of the Third Reich and Their Global Appe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4.

④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7-59.

⑤ Walter Shepard,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9, No. 1, 1935, p. 19.

只是为避免抨击，后者的众多法西斯元素被罗斯福选择性地剔除了。^① 1938年，罗斯福在关于研究德国制度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写下：“所有的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做政策规划，尽管我们的方法是民主的那一种。”在罗斯福的要求下，美国的专家出于正面学习的目的，研究了“力量来自欢乐”（Strength through Joy）、“国家劳役团”等德国国家主导的社会组织和政策。^② 可见，尽管美国决策者仍然由于身份对比而不完全接纳德国的治理知识，但这种意识形态偏见烈度并不高。

1940年后，罗斯福及其政策团队将德国视为美国和西半球面对的最大安全威胁，德意日三国签署的同盟条约更增加了体系性的压力。^③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其“炉边谈话”中痛陈纳粹德国不但宰制本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并且图谋奴役欧洲、征服世界，民主信仰危在旦夕。他呼吁美国虽不参战，但必须成为“民主的大军火库”（great arsenal of democracy），帮助英国等参战国守护自由和民主。^④ 可见，在权力结构压力高企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的意识形态责难骤然上升至模式竞争层面，德国直到此时才被描述为体系性的意识形态对立面。

（三）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二战后，由美国主导设计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的民主化被视为霸权国引导下的社会化的成功典范。^⑤ 但是，因为与美国长期存在经贸摩擦，且两国经济势头一升一降对比强烈，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成为美国从政客表态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对象，甚至

① Kiran Klaus Patel, “Learning from the Enemy? Th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i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Transatlantica*, No. 1, 2006,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atlantica/785>.

② Kiran Klaus Patel, “Welfare in the Warfare State: Nazi Social Polic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Bulletin*, Vol. 37, No. 2, 2015, p. 27.

③ Stetson Conn and Byron Fairchild,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 Framework of Hemisphere Defense*, p. 68.

④ Franklin D.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16: On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December 29, 1940, <https://millercenter.org/the-presidency/presidential-speeches/december-29-1940-fireside-chat-16-arsenal-democracy>.

⑤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p. 187-189;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p. 304-307.

□ 当代亚太

出现了“敲打日本”(Japan-bashing)一词用以描述这一政治社会风潮。^①在权力结构压力的高点,即便是意识形态属于同一阵营的日本,也面临来自美国基于模式竞争的责难。

自70年代起,日本即对美国长期保持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两国在商品贸易、技术转移、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法规等方面不断产生摩擦。^②到了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颓势,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学者和媒体人开始担心日本将成为比苏联更为严峻的威胁。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例子是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长文《日本之危险》(*The Danger from Japan*)。在这篇文章中,白修德细数日本的经济体制、发展理念、产业政策和贸易规则如何为其创造了不正当的经济优势,美国众多产业由此受到重创,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为其提供安全和经济公共物品的基础上完成的。他警告,20年内,日本将沿此不公平的发展路径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工业强国。^③

在权力结构压力下,美日间治理知识的差异开始凸显,基于身份对比的意识形态责难被激化。更多的美国学者和政论人开始关注日本的异质性,认为日本已经发展出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视角被统称为美国对日思维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对日“修正主义”的招牌下存在各异的主张,但当时美国各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与自由市场决定经济结果相反,日本系统性地仰赖官僚部门、银行与企业间的合谋,以重商主义理念扭曲资源配置,促成自身的高速发展。^④特别是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这种另

① Narrelle Morris, “Destructive Discourse: ‘Japan-bas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Japa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h. D. dissertation, Murdoch University, 2006.

② 大矢根聪:《日美经贸摩擦的政治解决过程——兼论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第132~134页;肖河、潘蓉:《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日美贸易冲突——对“广场协议叙事”的再审视》,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第103~105页。

③ Theodore White, “The Danger from Japan”,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85, <https://www.nytimes.com/1985/07/28/magazine/the-danger-from-japan.html>.

④ 于铁军:《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第60~63页;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74~77页;R. Taggart Murphy, “Making Sense of Japan: A Reassessment of Revision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43, 1996, pp. 52-56.

类发展模式被视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面临的^①最大威胁。

尽管一些对日“修正主义”者的初衷或许更多地在于劝导美国自身反省、调整政策，但日渐流行的“修正主义”论调成了“敲打日本”的基本依据，而“敲打”内容也上升到了意识形态核心层面的质疑和贬低。比如，对日“修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在1989年出版其代表作《日本权力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指出日本虽有民主国家之形，但其政治运行逻辑与（西式）自由民主理念大相径庭。范·沃尔夫伦认为，日本不存在如其他国家政府一样的权力中枢和问责主体，其政治权力分散在自由民主党、官僚组织、财经界等半自主、保守而威权的行为体之间。这些行为体间交错的权力关系构成一个没有最高中枢的“系统”（the System），不对选民负责、压制个人自由。^② 有学者指出，这种从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剖析日本政治的论断使得“敲打”日本变得更加容易、显得更加合理。诸如《日本权力之谜》的论著为抨击日本提供了学理支撑，“不会使你听起来像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或无端指责之人”。^③

又如，1991年，媒体曝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项委托课题的研究报告，这份题为“日本2020”（Japan 2020）的报告由诸多政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共同完成，其中包括对日“修正主义”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该报告指出，日本没有民主的决策过程，其政企精英善于操控日本和美国的民意。该报告认为，日本不断追逐权力和财富，却毫无国际责任感、无视全球福祉。该报告预测，这种“天然地不利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日本范式”将取代“西方范式”，西方价值观岌岌可危。^④ 这份报告将日本可能的意识形态威胁进一步上升到了模式竞争层面。

到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许多美国民众已经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深感

① Brink Lindsey and Aaron Lukas, “Revisiting the ‘Revisionist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conomic Model”, Trade Policy Analysis No. 3, Cato Institute, July 31, 1998, <https://www.cato.org/trade-policy-analysis/revisiting-revisionists-rise-fall-japanese-economic-model>.

② 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London Limited, 1989, pp. 41-44.

③ Michael Heale, “Anatomy of a Scare: Yellow Peril Politics in America, 1980-1993”,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9, pp. 36-37.

④ Paul Horvitz, “CIA-funded Study Says Japan Lacks Global Responsibility”, June 8, 1991,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1/06/08/cia-funded-study-says-japan-lacks-global-responsibility/bccd3047-8cf6-4c46-9236-10a5304312d8/>.

□ 当代亚太

忧虑，特别是担心美国输掉对日本的竞争。^①“敲打日本”因此成为众多总统竞选人的主打话题。^②虽然最终当选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竞选时展现了对日温和的态度，但其上任后采取的对日经贸政策与“修正主义”路线吻合，据称，当时的美国政府高官都不同程度地是这一路线的支持者。^③

直到 90 年代中后期，“敲打日本”的声浪才在美国逐渐退去，那时美国早已重振经济，而日本却陷入停滞。尽管日本对美国造成的权力压力主要限于经济层面，且在其他时期都被视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伙伴，但日本在治理知识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仍然被美国放大分析，权力结构压力在越过一定“门槛值”后显著激活了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责难。当然，即使在对日“修正主义”思潮的高潮期，这一路线取向并未成为美国的舆论共识，美国也一直存在着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对日态度更加积极和缓的力量。^④日本与美国客观上的意识形态趋近使其受到的意识形态责难并没有达至高烈度。

（四）冷战结束后的新加坡

新加坡建国后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被归入（竞争性）威权国家之列。^⑤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关系中典型的小国，^⑥新加坡与美国毫无权力竞争可能。不但如此，新加坡一直保持着与美国密切的安全合作，是美国在东南亚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冷战结束后，新加坡通过塑造国际舆论、培训外国官员等方法主动解释和传播自身的治理知识，其受众

① Daniel Yankelovic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 4, 1991, p. 2.

② Walter Shapiro, “Japan Bashing on the Campaign Trail”, *Time*, February 10, 1992,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74842,00.html>.

③ 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第 78 页。

④ Narrelle Morris, “Destructive Discourse: ‘Japan-bas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Japa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p. 86-90.

⑤ Stephan Ortmann, “Singapore: Authoritarian but Newly Competiti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2, No. 4, 2011, pp. 153-164; Lee Morgenbesser, “The Autocratic Mandate: Elections, Legitimacy and Regime Stability in Singapo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2, 2017, p. 205. 发明“竞争性威权主义”一词的勒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韦（Lucan Way）将新加坡定性为完全威权主义。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4.

⑥ Andrew F. Cooper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Alan Chong, “Small State Soft Power Strategies: Virtual Enlargement in the Cases of the Vatican City State and Singapor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3, 2010, pp. 383-405.

包括西方精英。尽管仍面临意识形态层面的质疑，但新加坡的治理知识传播一定程度上为其争取到了西方主流话语的承认和理解。

虽然被视为威权独大政党，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不秉持任何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标榜自己。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对新加坡人权状况的批评以及民主化压力都在增加。在此背景下，“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成为新加坡的核心政治话语。“亚洲价值观”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并不适用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有效治理、社群利益、国家自主等价值更为重要。^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李光耀为首的一批新加坡高官（后被称为“新加坡学派”）在国际舞台上频繁而高调地捍卫“亚洲价值观”，主张西方抽象的自由主义概念需要考虑到独特的文化背景。据张嘉松（Alan Chong）的描述，在1993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上，新加坡外长黄根成（Wong Kan Seng）基于亚洲价值观的发言成功地回击了西方对亚洲国家人权状况的批评，并且使相关理念开始为西方注意。^② 此外，“新加坡学派”积极地在西方主流舆论平台上发声，系统性地阐述亚洲价值观的内涵，相关文章发表在一系列有政策影响力的美国刊物上。^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观失去了治理绩效基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倡导者不再积极推广这个概念。^④ 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在此次危机中受影响较小，西方国家和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仍然看重其治理经验，并与其合作供给治理知识。用张嘉松的话来说，一个“混杂的‘新加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达国家’知识共同

① Donald Emmerson, “Region and Recalcitrance: Rethinking Democracy Through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2, 1995, p. 237.

② Alan Chong, *Foreign Policy in Global Information Space: Actualizing Soft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07.

③ Kishore Mahbubani, “The West and the R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8, 1992, pp. 3-12; Bilahari Kausikan, “Asia’s Different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No. 92, 1993, pp. 24-41; Fareed Zakaria,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2, 1994, pp. 109-127; Bilahari Kausika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Asian Values’: Governance that Work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 No. 2, 1997, pp. 24-34.

④ Mark Thompson, “The Survival of ‘Asian Values’ as ‘Zivilisationskritik’”,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5, 2000, pp. 653-654; Laurence Wai-Teng Leong, “From ‘Asian Values’ to Singapore Exceptionalism”, in Leena Avonius and Damien Kingsbury eds., *Human Rights in Asia: A Reassessment of the Asian Values Deba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21.

□ 当代亚太

体”就此形成。^①

与此同时，自1992年起，新加坡推出“新加坡合作计划”（Singapore Cooperation Programme），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官员培训，传授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治理知识。截至2019年，“新加坡合作计划”已经培训过超过170个国家的12.5万多名官员。^②在“新加坡合作计划”之下，新加坡还在卡塔尔、约旦、柬埔寨、老挝、缅甸及越南等国单独开设了培训机构。中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及菲律宾等国政府也主动将本国官员送至新加坡进行考察学习。截至2017年，仅在南洋理工大学，就有超过1.5万名中国官员接受过培训。^③新加坡大规模的治理知识传播行为并未显著引致关于模式输出的怀疑和忧虑。相反，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都有一定影响力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甚至撰文称，新加坡的治理成就或许说明，（西式）自由民主并不是世上唯一好的治理模式。^④

当然，基于身份对比，^⑤新加坡的治理知识仍然不时地面临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责难，但总体烈度并不高。比如，1994年，19岁的美国公民麦可·彼特·费尔（Michael Peter Fay）因为在新加坡故意破坏财物和偷窃被判鞭刑6下（后在美国政府请求下减少为4下）。由于鞭刑的特殊性，这一事件在美国引发了针对新加坡治理知识的舆论抨击。《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称，新加坡不过是用儒家传统和家庭观念来包装极端的威权主义统

① Alan Chong, *Foreign Policy in Global Information Space: Actualizing Soft Power*, p. 133.

② “Singapore Cooperation Programme Training Calendar 2019/2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https://tinyurl.com/mfascpcalendar2019>, p. 3.

③ 《社论：新中有很大的互学互鉴空间》，载《联合早报》，2017年10月28日，<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71028-806549>。

④ Graham Allison, “Singapore Challenges the Idea that Democracy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ance”, *HuffPost*, August 5, 2015,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singapore-challenges-democracy_b_7933188.

⑤ 美国也出现过在模式竞争基础上批评并提防新加坡的治理知识的声音。比如，林一琼斯（Sean Lynn-Jones）曾将亚洲价值观称为“当代对民主最关键的意识形态威胁”，尽管其关注点不完全在于新加坡，而是在于东亚数个国家在这方面的趋同。Sean M. Lynn-Jones,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pread Democracy”,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rch 1998,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why-united-states-should-spread-democracy>。

治。^① 但与此同时，美国舆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赞赏新加坡用严厉惩罚保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声音。^② 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表态则较为平衡，尽管他认为新加坡的鞭刑“过于极端”“是个错误”，但同时表示，新加坡“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法律”，从而没有将此事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③

在2021年12月的一次公开活动中，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许通美（Tommy Koh）抱怨美国没有邀请新加坡参加首次“民主峰会”。他指出，世界上没有单一的民主形式，而美国民主党从未将新加坡视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新加坡前驻美国大使陈庆珠（Chan Heng Chee）也指出，当2000年“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成立时，新加坡同样没有受到邀请，因为美国“非常担心我们会在其中宣扬亚洲式的民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代办拉菲克·曼苏尔（Rafik Mansour）则回应称，美国“有很多需要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④ 这一事例体现出新加坡与美国之间仍因治理知识差异存在一定龃龉。

（五）小结与讨论

图2以坐标系的形式呈现了表1中的理想型分布，并将本文涉及的四个案例在各自时空背景下的相对坐标标出。^⑤ 治理知识差异感知与权力结构压力的叠加效应充分体现在取值特征各不相同的案例中，并彰显出当代崛起国所面对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之独特。

① “Singapore Doesn’t Have All the Answers”, L. A. Times, March 21, 1995,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5-03-21-me-45122-story.html>.

② Vinay Lal, “The Flogging of Michael Fay: Culture of Authoritarian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23, 1994, pp. 1386-1387.

③ Ron Fournier, “Clinton Decries Planned Singapore Flogging of American”, AP News, April 15, 1994, <https://apnews.com/article/074a9b219ed656421af7c01425cc56c3>; Charles P. Wallace, “Decision on Caning Disappoints White House”, L. A. Times, May 5, 1994,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4-05-05-mn-54203-story.html>.

④ Hana O, “Tommy Koh: Why US Does Not Consider Singapore a ‘True Democracy’”, *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 December 10, 2021, <https://theindependent.sg/tommy-koh-why-us-does-not-consider-spore-a-true-democracy/>.

⑤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的分析框架并不试图绝对性地量化一国在任何时空中遭遇的意识形态责难程度，因此，图2中不同案例坐标之间的绝对距离不具实际意义。

□ 当代亚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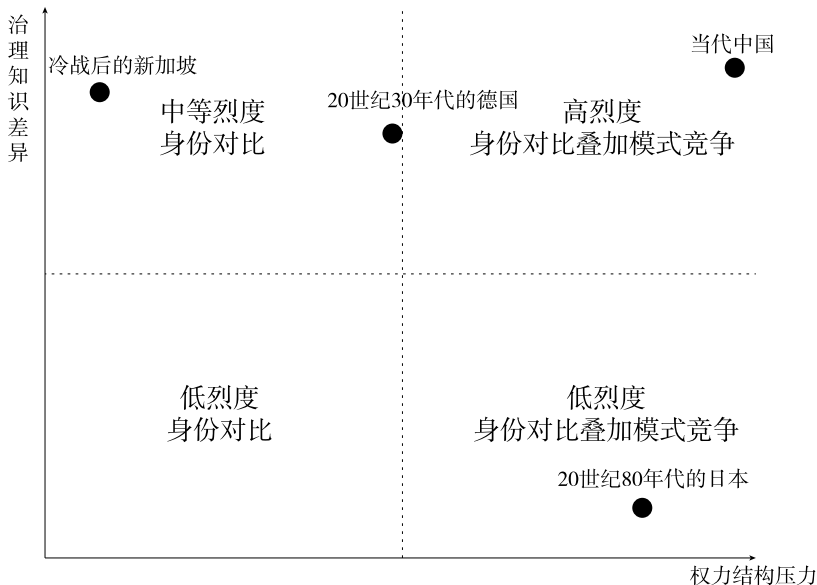


图 2 四个案例在各自时空背景下的相对坐标

资料来源：同表 1

第一，四个案例体现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权力结构压力与治理知识差异相互调节对意识形态责难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案例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取值都较为极端，对比考察其他三个案例可以看出，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责难并非单一因素的高取值可以解释。冷战结束后的新加坡与当代中国处于同一国际体系内，两国在美国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中均处于劣势，也有着类似的治理知识传播动力。但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新加坡给美国造成的权力结构压力的上限非常低，使新加坡的坐标稳定地处于图 2 坐标系的左半边。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案例则说明，即使权力关系紧张触发了基于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但日本与美国相近的治理知识起到了减缓这一防范倾向的作用，日本终究没有遭遇高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处于图 2 坐标系的右下角。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虽然用较高强制性的方式传播治理知识，但它并不与当时的美国构成针锋相对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彼时德国遇到的意识形态责难基本以身份对比为基础，没有上升为较高烈度的模式竞争防范。因此，即使当代中美之间的治理知识差异的绝对值或许小于 30 年代美德之间治理知识差异的绝对值，但两个案例中的国际结构背景截然不同，导致其在

各自时空背景下的相对坐标方位迥异。直到 1940 年后，德国案例的坐标才骤然从图 2 坐标系的左半边跨越到右半边。

第二，四个案例反映出权力结构压力的持续增强可能导致意识形态责难的性质变化，治理知识传播发生的时机影响其对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潜在作用。若将当今中美关系的背景代入德国和新加坡的案例中，德国和新加坡积极传播治理知识的行为都足以构成当今美国所防范的意识形态“进犯”。但在当时，德国和新加坡的治理知识传播不但没有显著刺激美国的意识形态责难，还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美国的理解和认可。除去美国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感受到的治理知识差异有别外，^① 这两个案例与中国案例的区别体现出各类因素发生的时序的重要性。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开始于美德间权力结构压力骤升之前，新加坡的治理知识传播则长期发生在低权力结构压力的背景下，这两种情况均有助于回避高烈度的、基于模式竞争威胁的意识形态责难。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治理知识传播努力与权力转移进程同步发生，坐标位于图 2 坐标系右上角的中国已经失去权力结构压力较小时的“窗口期”，陷入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中。

80 年代日本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在两国权力关系呈紧张趋势的作用下，激发模式竞争威胁的“门槛值”已经跨过，崛起国成功的治理绩效反而可能凸显治理知识差异。即使美日同属一个意识形态阵营，日本亦无意输出替代性的治理知识，但是美国对权力转移的忧虑使模式竞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防范成为合理且有利的推论。

总之，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印证了本文提出的意识形态责难的分段函数式框架。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中美围绕治理知识的互动有着其他案例都不具备的“极端取值”，特殊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中国处于持续强化的意识形态责难压力之下。尽管如此，这一局面对中国而言之所以是难题，正是因为中国仍然无意拥抱这一趋势，从而滑向体系性的意识形态对立。^② 理解结构层面的机理有助于更具针对性地发挥能动性，而非否定能动性的可能潜力。

^① 严格而言，德国和新加坡在这方面不完全一样。1930 年的美国不认为德国是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威胁，且本身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愿意有选择地吸收德国的治理知识。冷战结束后，新加坡和中国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二分法中均属于“落后”阵营，心怀“历史终结”之感的美国对新加坡的治理知识虽有一定正面评价，但没有强烈动机向其学习。

^② 阎学通：《为何及如何防范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加剧》，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Ⅲ～Ⅴ页。

□ 当代亚太

五、结 语

通过将“挨骂”问题理论化，本文认为，崛起国面对的意识形态责难是由治理知识差异和权力结构压力叠加起作用的结果，而且在权力结构压力足够大时，治理知识传播难以起到减缓责难的效果。当代崛起国处于大国权力接近和意识形态二元区隔的特殊国际结构中，在这一时空背景下，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动力与守成国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互相强化，构成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

本文的发现说明，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是中国亟须解决的“挨骂”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讲好故事”的努力可能难以显著地缓解这一状况，反而可能加重美国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这是当代中国所处国际结构塑造的一种特殊的、并不乐观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挨骂”是与“挨打”“挨饿”截然不同的问题。后两个问题的解决几乎单纯仰赖国家实力的发展，而“挨骂”问题则可能因为国家实力大增而激化和加剧。因此，崛起国需对自身治理知识的国际反响有合理预期，避免过于绝对地将消除意识形态责难设为解决问题的标准。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的讨论不意味着主张中国放弃治理知识传播。中国的发展让发展中国家看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中国在各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知识，可供发展中国家选择性地学习吸收。^① 比如，埃塞俄比亚在经济发展中借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设置经济特区等方面的经验。^② 格林纳达政府委托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其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③ 泰国总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赞赏中国精准扶贫的经验，并在基层着手模仿中国的驻村扶贫措施。^④ 可以想见，只要中国保持较好的治理水平和发展势头，类

① 黄琪轩：《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25~45页。

② John Åberg and Derick Becker, “China as Exemplar: Justin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the Unorthodox Orthodoxy of The China Model”, *Politics & Policy*, Vol. 48, No. 5, 2020, p. 827.

③ 孙梦文：《格林纳达邀中国帮助规划国家发展战略，国开行已交付蓝图》，澎湃新闻，2017年12月2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4959。

④ 吉楠吞：《中国精准扶贫经验令泰国受益》，载《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日，第3版。

似的例子将会越来越多。但本文的发现的确实表明，在大国关系发展的特殊阶段中，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正面评价或许难以有效解开“挨骂”难题，也不会促使美国“反省”自身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而可能加深美国对于体系性模式竞争的防范。局部性获益与结构性难题之间潜藏的张力值得持续关注。

本文虽然试图阐释“挨骂”难题的生成机理，但无法提供简单的“解题方案”。从乐观的角度而言，若能打破本文描述的逻辑链条，中国面临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或能迎刃而解。循着滋生这一难题的机理逆推，摆脱困境或者需要中国的治理知识在国际体系中积蓄足够强大的吸引力，或者需要大国权力竞争变得不再显著或重要。无论是哪种路径（二者可能同时发生），都要求中国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治理知识才有可能达致。^①“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须以战略定力和智慧来考量和应对“挨骂”问题。

^① 中美均有学者认为，当代大国竞争的落脚点在于各自的国内治理能力。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129页；Thomas Pepinsky and Jessica Chen Weiss, “The Clash of Systems? Washington should Avoid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June 11,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6-11/clash-systems>.

Abstracts

Power and Prejudice: The Conundrum of Governance Knowledge Promo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Rising Power

Wen Yao

Abstract: Governance Knowledge of a rising power is a body of ideational goods that crystalize it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and governance achievements. Do “telling its story well” and promoting governance knowledge help the rising pow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being scolde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ends to offer a pessimistic answer. On the one hand, the contemporary rising power has risen in an international order imbued with ideological biases, so it is strongly motivated to demonstrate the peculiarity of its governance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with increasing pressure exerted by the power structure, the established power tends to enhance its ideological precautions based on “identity comparison” and “model competition”. The two dynamics reinforce each other, giving rise to the “positive feedback loop” of ideological censure. This mechanism could then be extended to deriv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degree of ideological censure. Governance knowledge dissimilarity and power structural pressure moderate each other’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egree of ideological censure, while a “threshold” exists for power structural pressure, beyond which precautions against model competition could surface. Thus, the timing of governance knowledge promotion has an impact on whether ideological censure of high intensity would be triggered. Even though China tries to avoid ideological rivalry when promoting its governance knowledge, the twin structural factors—ideological bifurcation and power parity—have kept American ideological censure against China at a high level. The respective

experiences of “being scolded” of three cases-Germany in the 1930s, Japan in the 1980s, and Singapore after the Cold War-further corroborate the mechanisms undergirding ideological censure, and highlight the distinctness of the temporal-spatial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contemporary China finds itself. The conundrum of “being scolded” is a unique by-product of a state’s rising trajectory; the contemporary rising power shall hav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bout the effects of governance knowledge promotion.

Key Words: Power Structure; Ideology; Governance Knowledge; Rising Power; The Problem of “Being Scolded”

About the Author: Wen Yao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stitutional Choices

Yang Shuangmei

Abstract: Return or back to multilateral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note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U. S. has not consistently returned to all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t previously threatened to exit, the selective back is worth concerning.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promotes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eadership has been highly regar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U. S. , the return mainly depends on the cooperation that could help restore its leadership. It can be measured by whether the U. S. could share the burdens, acquire the gains, and influence the agenda settings. Based on this judgmen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olds a selec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choices of the U. S. not only helps to clarify the motivation of the U. S. but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